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三期 ——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6 d）

【研究报告】毛泽东代表了哪些人？	陈小雅
“大批判”与诅咒巫术	王 毅
【不堪回首】文革：蹂躏下偷生	巫宁坤
【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研究报告】

毛泽东代表了哪些人？  
• 陈小雅 •

在中国国内，毛泽东研究，限于政治环境，只是执政党旨在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政治结论的工具；在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有：把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比较的施瓦茨、迈斯纳、施拉姆、德爾斯科和斯塔爾等人的研究；把毛泽东思想与格拉姆西、卢卡奇、卡尔斯、马尔库塞和康德、黑格尔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进行比较的魏克曼、迈斯纳等人的研究；六十年代初期，在英国《中国季刊》上，也曾有威特福格尔与施瓦茨关于毛泽东的“主义”与“思想”之争，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和“非毛化”思潮的登陆，更为以后的“论战”提供了日新月异的内容，但这些研究也不免带上冷战色彩。在大部份属于真正“学术”的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独特事物看待；更多的文章仍流于声讨檄文和“政治控诉状”。至于毛泽东思想或主义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人言言殊，各持一端。

但凡对毛泽东的资料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研究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

的晚年思想，即使排除政治的因素，也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毛的言论很多，很散，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等几篇论文外，几乎没有正经的著作。因此，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决不等于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而且他的言论显示，其思维跳跃性很大，论事评人经常使用暗喻，对古代人物、典籍信手拈来，研究者难免不知所云或产生歧义。不仅如此，毛的言论还带有夸张的特点和随意性，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的话语，含义可以完全相反；声东击西也是他驾御言论的常见战术之一，所以对于他的言论，若不是以“不要太认真”的态度对待，欲求得真正的理解，就非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个清楚，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麦克发夸尔先生，他的一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已经写了六十多万字（全书三卷，共有一百万字），几乎给我们搬出了整整半部中国现代史，却还没说清楚这“起源”究竟在何处。

在毛泽东研究中，论述其晚年所犯错误，一般是从大跃进开始的，而不少的论者已经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是毛泽东所犯另一个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前导，许多人由此出发，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这件事，上升到一个主要的地位，从“内心阴暗”的角度解释他此后的行为，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是为了一泄自己不得不承担大跃进的失误那口“鸟气”。由此，也奠定了“文革权力斗争说”的基础，仿佛毛泽东是在用后一个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这位人们心中的“伟大领袖”，不过是一个心胸狭窄、思想浅薄、性情乖戾、头脑发昏、不负责任的“混世魔王”。

这固然是一种逻辑上自洽的说法，因为它可以找到大量的旁证。比如，此前中共党内“一线”、“二线”的划分，此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敬而远之”态度的不满，以及对刘少奇等背着毛安排给他安装窃听器行为的震怒，等等，都可以作为毛泽东与对“架空”他的行为的“权力斗争说”的论据。但这种观点蔑视了中共其他人的存在，仿佛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共产党元老，都是毛泽东这个“暴君”手里的玩偶，他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前可以一怒之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在后可以象处死一个“臭虫”一样的捻死刘少奇。而且，更无法解释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地把一场“权力斗争”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次于“炮打司令部”的重要内容，是“斗私批修”？一个胡打乱闹了一场的“混世魔王”，居然在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自己的两大功绩，其中之一就是将他自己活活拖死的那场迟迟不能收场的文化革命？

还有没有另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呢？就笔者所见，王力雄先生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突破的。大跃进的失败，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导因，但这个原因不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它就明显地存在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本身的谬误之中。王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使他（指毛）看到‘公’与‘私’的对抗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的，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会连私有制都不如——这才是导致了整个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的“战友”们？作为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共产党员，碍于意识形态的外壳，他们只能称自己的思想是权宜之计，是“不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原先为“解放劳苦大众”所建造的这个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成了自己的“异化物”。而原教旨的毛泽东，却没有“因噎废食”，他不仅握有马克思主义的“魔咒”，具有先声夺人的威势，而且在道德上采取了堵人之口的“让步”：在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失误面前，独自承担了其他人也应份担的责

任。而在这“仁至义尽”的后面，他已做好了以后的部署。王文指出：“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仅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争夺权力也不是主要的。”

第一个理解毛泽东思想，并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是被称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林彪。此时，与“私”字绝无缘份的军队成为了普及毛泽东思想的第一块试验田。而文化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不仅因为他们是“封资修”思想传之万代的载体，而且就其财富——知识、思想——的存在形式而言，本身就是最大的“私有者”。所以，要“与一切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首先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洗脑”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觉“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样，是这次革命要基本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推行这套路线，必然在开始就遇到了“权力”的问题，并最终要变更权力主体。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那些战友们，是他推行这条路线的障碍。

以往的革命是要消灭私有制，而现在的革命是要消灭私有观念——显然，合理地解释了毛泽东为“大跃进”总结的“教训”，也就顺利地揭开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而找到了这一目的，也就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和方式，从而也就找到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

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的确可以将它划为前后两个部份。其中前一部份，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其中有得自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由“巴黎公社”创造，经列宁主义完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后一部份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中外“乌托邦”主义者“建立大同社会”的设想；主张“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苏式“苏维埃+电气化”的建设模式。这些思想，均非毛泽东的独创。所以，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结合，或者执政党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亦无不可。真正属于毛泽东个人的，是他的上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其实践模型，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为了重演古今中外都有的“权力斗争”，而是要造就“新人”，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主义”。

剖析毛泽东主义，我们自然也会发现它有许多从中外哲学家、政治家那里继承得来的东西，如作为东西方帝王的传统的“政治专制主义”；希特勒发明的“极权主义”；日本社会学者的村社自治理想，以及毛泽东启蒙时代所接受的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孟子的“民本”思想，以及沐浴了毛泽东等整整一代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诉求。根据汪澍白先生对早期毛泽东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越到晚年，毛泽东受其早期教育思想影响的痕迹就越严重。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们，不仅赋予了它们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并将其付诸实践。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主义，可以被表述为“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马列主义为现实政治武器，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现代极权主义”。否定毛泽东主义，就要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把这种不符合人性、人情、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作为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其理想主义成份，也许在西方国家和未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实利文化”中，仍能发挥批判与制约的作用，但这丝毫不成为今天在中国整体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障碍。

在中国，不论是乡居农村的耕夫，还是身栖学府的知识分子，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对毛泽东都有个说法。不论是作为观众，抑或是作为受益人，还是作为受害者，他们都曾亲自领略过他的政治艺术，深受其思想的濡染，再加上以毛泽东为符号的一代人创造的政治现实已经成为今人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评价毛泽东，不仅很容易与政治的结论形成矛盾，甚至也很容易触动人们感情之弦。惟其如此，要做到公正又公允，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其中一个分歧最大的观点是，毛泽东究竟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说毛泽东代表了普通老百姓，恐怕异议较小，因为在那个时代，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代表富裕和有产的阶级，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代表了贫穷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共产党打天下，靠的也是“泥腿子”人民大众。那么，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除了不代表被打倒的阶级以外，应该说，是代表“人民”的全体的。尤其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来的有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已经变化，阶级的对立基本消失，而在理论上，各级政权仍是“人民的政权”，所以，说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群众”，这句话已经失去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含义。那么，毛泽东究竟代表的是哪一部份人的利益和愿望的呢？

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是一个曾经被他探索使用的概念，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反对“八级工资制”、官僚科层制、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等等一系列步西方工业化过程后尘的“现代化”道路的政治路线是一体的。据说，毛泽东也探讨过“计划经济”是否要消灭商品的问题。列宁的实践，解决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权力问题，但没有解决社会道路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仍然要通过“血淋淋”的剥夺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道路，然后才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下进入社会主义，这仍是实验中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验，无非是想绕开隔绝着“农村公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那个“卡夫丁峡谷”，寻找一条没有痛苦的进入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在被“大跃进”假象蒙骗，胜利冲昏头脑时，已经表露无疑。而务实的刘邓，对这一点显然是将信将疑的。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显然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所以，他们与毛泽东之争，的确是路线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已经有了历史的定论。而且，众所周知，“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不关心人民疾苦，靠剥削人民为生的权力阶层。在现实中，邓子恢、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们的行为恰恰不是脱离了人民，而是迁就了人民，所以，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看上去就有点儿牵强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说谁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固然是人民群众的特征，它不会因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而有本质的变化；同样，幻想乌托邦，激情浪漫，狂燥，也是人民群众的习性，尤其是其中小知识分子习性。它们也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去世就从社会中绝迹。刘邓是为他们的眼前着想，毛泽东是为他们还没有看见的将来着想。在“代表”人民方面，他们只是“各有千秋”而已。

毛泽东的个性中确实有“奇里斯马气质”。他喜欢直接面对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驭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大大受到欢迎。所以，他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提供了依据。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

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 and 商品供应状况。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他所代表的“人民”，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在智识上处于中小知识分子程度，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状态，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份，而绝非“被统治”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和期待出现“奇迹”的“大救星”，是他们的宗教偶像，也就是“精神的鸦片烟”。

目前，在海外，已经有“民运人士”声称，当年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人民群众在文革历史条件下，争取民主斗争的政治成果。其得而复失，完全是因为老“走资派”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可见，毛泽东这杆旗帜，已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在未来的阶级冲突中，他再一次被利益失落的人群祭起作为思想旗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 原载《民主中国》2001年第5期

∞ ∞ ∞ ∞ ∞ ∞ ∞ ∞ ∞ ∞

### “大批判”与诅咒巫术

• 王 毅 •

在《“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1〕一文中，我简要地指出“文革”在众多方面都是以原始文化为基因，以巫术方法为操作手段的。为了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承传关系（尽管在常规思维的层面人们很难想象，最激烈地标举“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革”竟然会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大批判”这个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追溯一下其原理和方法是怎样直接继承了原始文化精神的。

所谓“大批判”，就是用证言文字讨伐“帝、修、反”、“地、富、反、坏、右”、“黑帮黑线”等等一切“牛鬼蛇神”。它是“文革”中应用最广、最多的“斗争武器”。十多年间，从早到晚充斥在一切报纸、书籍、广播、文艺作品、大字报、批判会、斗争会、学习班、甚至无数的家庭生活之中。只要翻阅一下“文革”时“大批判”文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文化构成并不复杂：除了专制主义时代政治角逐中常用的诬陷栽赃、指鹿为马以外，它更主要的内容就是对被害者的思想、言行加上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十恶不赦的罪名；对其出身、人格、姓名、形像、命运等等几乎一切与被害者相关的事物进行肆无忌惮的诅咒。诸如“砸烂狗头”、“油炸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大批判”词汇。因为一切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极为熟悉无数这类口号、标语、文章的内容，所以本文不拟占用较多的篇幅对之征引，而是把重点放在分析这一切诅咒的文化成因、以及诅咒在“文革”中极度膨胀的原因等等问题上。

## 一、诅咒巫术的基本原理

如同“文革”时妇孺老幼都必须天天参加“大批判”一样，诅咒巫术的原理亦并不复杂，因为从源头上说，越是在人类文明原始简陋的时代，诅咒巫术就越是人们抵御牛鬼蛇神最必要的手段，所以它的文化特质也就显露得越清楚。

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完全或者经常处在神秘力量的包围之中，与人类物质手段的孱弱相比，这些随时随地能够给人们带来各种祸患和灾难。所以人们也就必须以他们仅有的手段抵御这神秘力量的压迫，这手段之一即是语言。又因为抵御的对象具有超自然和神秘的力量（例如以邪恶的魔力制造各种天灾人祸的牛鬼蛇神），所以作为与之相平衡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超自然和具有神性的，于是巫术中的禁咒也就应运而生。西方学者说：“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我们就看得到巫术。”〔2〕又说：“在社会的弱小和无望的成员中存在着实施超自然报复的强烈愿望。”〔3〕很显然，这种希望与恐惧的重压越是强大，人们希望通过赋予语言以魔力而实现超自然报复的愿望，也就越加执着。

那么，咒语的魔力的从何而来的呢？原来，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初期，总是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工具都是神的发明和恩赐，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六畜、黄帝造车、仓颉造字、鲁班造锯、嫫祖教民育蚕等等就都是世人熟知的例子。进而人们更对这些工具加以宗教的崇拜：“工具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反倒成为人受其意志支配的神或鬼人感到自己依赖于它，于是就是以种种具有宗教崇拜性质的礼仪崇拜它。在原始时代，斧头和锤子似乎尤其获得过这种宗教意蕴；对其它工具，诸如锄头、鱼钩、矛或剑的崇拜至今尚可在未开化部族中发现。在依韦部族中，铁匠使用的锤子被看作是一位强有力的神，依韦人崇拜它并奉献牺牲。”〔4〕在原始的工具崇拜中，人们不仅神化锤子、兵器等有形之物，而且亦同样对语言这种虽然无形、却最为重要的工具加以神话，甚至赋予它重大的魔力。例如“按照科拉印第安人和尤多多印第安人的说法，‘族主’创造了人和自然；但创世之后，他就不再直接干预事件的进程了。代替这种亲身干预，他赐给人他的‘语词’，即对他的崇拜和宗教仪式，这样人们就可以支配自然，获取为本部族幸福和繁衍所必需的一切。如若没有这种与始俱来的魔法，人们就完全无法维系生存。……谢基诺人他普遍相信，狩猎或捕鱼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某种语词，亦即运用了合宜的魔法公式。”〔5〕这种对语词的神化在巫术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从中国民间亦流行的类似风俗得到证明，例如旧时在航海、狩猎等危险的活动中，以及在年初一等关系重大的时日，就必须严格按习惯使用一系列吉语和专门语汇，否则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另外，咒语的神性和魔力还来自它是神的全部谱系身世、禀赋奥秘的凝缩，例如我国的景颇族就把鬼神的故事称为‘咒语’，这种‘咒语’除了祭鬼神时念诵外，平时是不能念的。

在巫术文化中，语言（特别是某些与神秘和神圣力量关系密切的语言）既然具有上述魔力，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要被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借助神性的语言以使自己得到庇护、遭邪魔的侵害。例如中世纪基督教认为“神圣的言语”与圣水、十字架等一样可以确保信徒“免受魔鬼的伤害。祈祷词的反魔王的威力极大，……以三位一体和圣休伯特的名义连续9天中每日念诵3遍祷文和3遍圣母祈祷文，便可以免遭一切疾病、妖术、疯狗和魔王之害。”〔7〕而更为积极的用途，则是直接利用神性的语言破败牛鬼蛇神的邪恶妖术、将其制服甚至咒死。这些能够致人死命的咒语当然也可以施之于任何敌人，于是诅咒也就成为降灾致害巫术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同样的道理，由于“文革”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横扫牛鬼蛇神”，于是诅咒这种祛除妖邪的古老方法也就不仅借助“大批判”的形式具有了最现实的用武之

地，而且获得了极度膨胀的强烈驱动力量。

## 二、“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方法和文化功能

如果对诅咒巫术与“大批判”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到它们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基本特点：

### 第一、强调咒语的根据在于无比神圣的事物。

人类学家指出：“几乎每个咒都有一项仪式所没有的部份，那就是神话的征引，征引巫术所本的祖先与文化英雄。”〔7〕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语辞的神性有最直接的根据，例如我国彝族巫师在除魅时要先当着作为牺牲和魔鬼化身的草人身上，随即将草人掷出门外，以示一切祸祟皆被赶出。〔8〕再如先秦时秦王对楚王的诅咒即以“布愍告于不（丕）显大神巫咸”等语开篇，意在将楚王之罪恶布告于神并引起神的愤怒〔9〕。又如道教驱鬼符录上照例都要写“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文革”时正是如此，在对“牛鬼蛇神”批判时，必首先宣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等等神圣的“语录”。在诅咒巫术中，征引神圣不仅是为了使诅咒者直接获得神的支持，而且也是为了使被诅咒者受以的惩罚是天怒神怨的结果，故而众多民族的举行“神明裁判”仪式时，都要当着神位或以神的名义诅有罪者，让他们遭雷劈火烧、甚至合家绝灭。“文革”时亦是如此，常常强迫无数“牛鬼蛇神”跪在毛泽东像前接受“大批判”，甚至在像前自己诅咒自己“罪该万死”。“文革”时几乎所有的“大批判”，都必定要归结到依靠“红太阳”的神圣光芒使“牛鬼蛇神”现出丑恶的原形，用“战无不胜”的神圣思想武器将反动分子和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彻底砸烂”，沿用的其实正是诅咒巫术的通则。

### 第二，诅咒往往是用语言对真实的驱鬼巫术和致害巫术过程的模仿。

巫术文化认为，模拟的方法可以感应真实的事物和过程，并得到真实的结果（例如巫师道士在祈雨仪式上洒水就可以使天得到感应而下雨，马道婆可以通过伤害纸人而真的杀死仇人）。根据这个原理，人们也同样认为可以用语言模拟驱鬼和施害巫术的真实过程，并得到同样的结果，即达到真关的驱鬼和施害的目的。研究者指出的：原始文化认为“在语言和神话之间，不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有着真实的一致性。”〔10〕而驱鬼语言与驱鬼操作之间具有的这种“一致性”的例子，比如以扫帚驱鬼在我国是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巫术风俗，扫帚也是具有扫灭鬼灵之神力的法器〔11〕。“文革”时，或者在宣传画中画满红卫兵手持扫帚扫灭“牛鬼蛇神”的形像，或者在“大批判”中，用“横扫”等等语词，几乎就是对巫术活动中以扫帚为法器扫荡鬼魅的驱鬼仪式的模仿。

具体例子如：

……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持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12〕

……我们要警告这些嗡嗡叫的苍蝇和比它们貌似强大的熊黑虎豹：你们这些害人虫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被各国人民彻底扫荡乾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3）

这类“批判”和诅咒的要义在于：首先，竭力通过具有神性的语言（“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或直接引用“毛主席语录”等神的经典）把敌人变成凶恶的猛兽、毒虫，或者说让猛兽毒虫幻化而成的魔鬼现出原形。我们知道，这种“现形巫术”原本是要真实的神物法器和通过实际的巫术操作才能实现的，例如中国古代流传有许多用照妖镜、圣水、圣火等神器而使魔鬼现出其野兽原形的故事，兹举一例：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境之力也。（14）因为咒语亦有与神器类似的神性，所以它同样可以使鬼魅显出原形，《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就有很多这类例子。

再进一步，人们也就用“毒虫猛兽”、“妖魔鬼怪”等等最刻毒的语言诅咒敌人，使其恶性见于天日。很早的运用如《诗经》中所说的“为鬼为蜮”（《小雅·何人斯》）；“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小雅·青蝇》）以后著名的例子比如：武则天在诛杀和流放了李唐皇族中反对自己的人们之后，一定要逐个将他们原来神圣的姓氏（唐代皇族与道教祖神李耳同姓）改称为“毒蛇”（15）。在古代西方，关于恶魔和恶人“变狼”、“变兽”以吃人、害人的巫术观亦极为流行，所以人们同样把敌人视为毒虫猛兽变成的魔鬼，例如在基督教中，恶鬼之名“别西卜”（Beelzebub）的意思就是苍蝇王，基督在世时此名为鬼王的通称。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亦认定魔鬼及其信徒最邪恶的伎俩即是变成狼吃人或者化成蛇害人。所以教士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最凶恶的诅咒语言让其现形、并且揭露他们身上野兽般凶残的本性：……滚开，蛇妖，阴险而作乱的敌人；……滚开，彻头彻尾无知的恶狼；滚开，魔鬼；滚开，现有一切动物中最坏最下贱的动物；滚开异端之神，被判处受永恒之火的地狱之怪；滚开，充满贪淫的窃贼和野兽；滚开，野猪，被判处永远受痛苦的亚魔；滚开，勾引妇女的淫棍；滚开，一切灾难和罪行的根源……（16）一望可知，“反右”到“文革”，日夜不停地用“大批判”把无数受害者判定为“披着羊皮的狼”、“钻进革命营垒的毒蛇”、“牛鬼蛇神”、“害人虫”、“豺狼蛇蝎”、“小爬虫”、“老狐狸”、“苍蝇”、“黑心魔爪”、“黑风妖雾”、“黑帮黑线”、“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所有这些语汇及其文化内涵，完全是从上述久远的诅咒巫术传统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人们甚至用诅咒对“阶级敌人”的魔鬼本做了更为确切详实的指证和划分，例如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此类“语录”最为流行：“盘踞在大部份中国国土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17）第二步，由于巫术文化中“模拟成真”的原理，所以在用诅咒使敌人现出毒蛇猛兽和魔鬼的本之后，同样可以用诅咒语言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的操作过程，并取得相同的驱鬼效用。仍以毛泽东号召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例，这种对害虫的“扫除”原本既可以如浙江宁波的“扫虫节”那样，每年由农民拿着扫帚到田里举行扫虫的巫术仪式，也可以用吃虫仪式（仡佬族有“吃虫节”），于惊蛰前在田里画出弓箭的形状以模拟射虫的仪式（湖北土家族民间有“射虫日”）等等方法祛除虫崇，而且咒亦是其中一法，例如布衣族村寨每年举行“扫田坝节”以保佑庄稼不遭灾，节日中要由巫师身穿道袍，口中念咒：“……神仙派我赶旱魔，涝鬼蝗妖快快逃，咒语一到你难活。”（18）又如云南阿昌族在举行祭祀土鬼的仪式时，要诅咒危害庄稼的老鼠、麻雀、蚂蚱，让它们得病死亡。

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亦习惯于把敌人视为具有魔法的毒虫，并对之加以彻底的揭露和严厉的诅咒，以使之现出丑恶的原形并“砸烂”它。例如唐代



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的《骂尸虫文》即是有名的一篇。柳宗元在此文中口诛笔伐的，即是道教所说潜伏于人体中伺机为蛊的“三尸虫”。而他在文中形容的毒虫之善于陷蔽、其禀性之无比恶毒、其阴谋卑劣之极等等一切文化特质，都是后来“文革”中的人们在切齿声讨“害人虫”时重申过无数次的。可见，不论是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政治文化中，对“害人虫”的诅咒和“大批判”，都早已是古已有之的定规。另外，从柳宗元此文的内容亦可清楚地看到，后来在“大批判”中极为流行的各种形容对“害人虫”痛加斩杀的语汇（例如“拿起笔做刀枪”、“杀上大批判的战场”、“口诛笔伐批黑帮”等等），决无一句是“造反派”的杜撰，相反，这些名句完全承袭了古来通用的诛、杀、斩、戮等诅咒用语，模仿的是驱鬼式中巫师以神圣的法器彻底诛灭妖祟的传统。

以诅咒和“大批判”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仪式的典型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文革”时极为流行的对联“火烧黑市委，油炸（黑帮）某某某”。何以会有这种“大批判”语言呢？原来，世界众多民族的巫术文化都认为火烧可以祛除妖魅（具体事例及其原理在“文革”时亿万次以“火烧”诅咒敌人，则显然是对这类巫术操作的模拟。“油炸”的诅咒亦如是：因为“油炸”原是一种最激烈酷虐的驱鬼巫术手段，常常是在其它比较温和的驱鬼方法不能奏效的时候，才由巫师架起油锅、炸鬼的模拟物，从此震慑恶鬼。中国古代民间和宫廷都普遍而长期地遵行以油炸祛除恶鬼的巫俗，大众食品“油炸鬼”（北方叫“油条”）亦源于此。尤其令人喟叹不已的是：千百年前的驱鬼巫师竟然与后来“文革”时“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模一样，是“油炸”与“火烧”同时并用！所以，“文革”时以“油炸牛鬼蛇神”的诅咒语言模拟这种具有久远传统的驱鬼操作仪式，就是无需思索的。

再如“大批判”中最流行的话：“把某某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令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已经把人打倒了，还要加之以“踏上亿万只脚”这样凶残的诅咒呢？原来这也是对具体驱鬼巫术的模拟，例如傣族风俗：“在打仗时，必请巫师行巫术，方法是做一个敌人的泥像，穿上从敌方偷来的衣服，经过诅咒，把上述泥像埋在路基上，让千人踩万人踏，认为这样会使敌人死亡。”〔19〕又如“文革”时到处流行的“炮打”、“万炮齐轰”等对“牛鬼蛇神”进行“大批判”的语言，毛泽东批判“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著名大字报，亦题为《炮打司令部》。于是人们可能会问：“大批判”本是以语言文字为武器的讨伐，那么怎么又成了“炮打”、而且一定要“万炮齐轰”呢？其实，读一下史籍中的记述，就不难知道这些“大批判”流行语的渊源：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堂射鬼。时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20〕皇帝亲征仪：……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21〕原来，以万箭“射鬼”亦是驱鬼巫术仪式中一种历代通行的方法。这种巫术及其观念的起源当然极早，因为上古人们对自己敬畏的神灵及其处所等一切有关的事物，皆忌以刀箭相向〔22〕。直到很久以后的明代，人们依然迷信和惧怕“射”的巫法效力，所以为了维系皇权的神圣，“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斩。”〔23〕而对于自己憎恨的鬼灵，则反其道而行之，要大“射”而特“射”著名的例子如商代的武乙、纣王、春秋时的宋康王皆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谓之“射天”〔24〕，其意在于让那些与自己为敌的鬼神被射得流血，以此作为对之最严厉的惩罚和厌弃。我国栗僊族民众在与敌寨械斗前要由巫师带领对之进行诅咒，还要“以弓箭或弩箭向敌方村寨的方向遥射”；哈尼族以泥偶象征恶鬼，然后在巫师率领下对之诅咒，并“往泥偶上吐唾液、抹鼻涕，……还以枪、弩向泥偶射去”〔25〕。诸如此类历史久远、应用文泛的“射鬼”巫法流传不绝，所以“文革”时在此基础上以“炮轰牛鬼蛇神”等等流行的“大批判”语言作为模拟，也就是很方便的事。

又比如我们知道，古人认为污物可以使得鬼灵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民间广泛流行“以污祛鬼”、“以粪驱鬼”的方术（26）。而在“大批判”中，这类巫术方法亦被种种污秽的诅咒语言加以直接的模拟，例如：“邓拓，你这套把戏是骗不过人的！你的反动本质我们已经看清了。是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甩在粪坑里沤肥料。”（27）而极为流行的“扫进历史垃圾堆”、“批倒批臭”等等“大批判”口号，当然就更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一原理炮制出来的。

以上我们说明，诅咒很大程度上是对实际的驱鬼巫术操作方法之模拟。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知识“文革”时的“大批判”何以会膨胀到铺天盖地的程度；既然人们的周围永远充满了“牛鬼蛇神”（关于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与“文革”中“牛鬼蛇神到处都有”原则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那么也就唯有让“大批判”这种最方便、最普及的“横扫牛鬼蛇神”的手段也无处不在，人们才有生存的可能。

### 三、“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文化特征

作为原始时代和“文革”时代最流行的文化手段之一，诅咒与“大批判”当然有其重要而显著的文化特征，而且由于原理与功能的一致，两者在文化特征也必然是密切相通的。下面分析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项。

#### 第一，诅咒与“大批判”之残酷性和野蛮性及其意义。

因为诅咒是对真实的驱鬼和降灾致害巫术的模拟，所以它就必然要充份体现降灾致害巫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否则诅咒也就失去了原的巫力来源。在更完整的文化背景上讨论“文革”野蛮性、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是笔者将另文详述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能够看到：“油炸黑帮”、“踏上亿万只脚”等等“大批判”语言的凶残和野蛮，并不仅仅是宣泄憎恶之情感的方式，而更主要的是驱蛮的诅咒语言在“大批判”中承担着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不论毛泽东在“文革”中怎样号召“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28），但此类“大批判”语汇却一直风靡全国。

人类学家对氏族部落中原始文化的调查说明：“人受了施过巫术的长矛刺伤，唯一有效的疗法是采取厉害的反巫术”手段之一，所以它也就充斥于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之中，例如我国湘西苗族巫术仪式上对鬼的诅咒：“开鬼肠，破鬼肚；破了鬼肚吃鬼心”（30）；再如汉代宫廷驱鬼仪式中的对牛鬼蛇神的声讨：“节解汝肉，抽汝肝肠！”（31）同理，当“文革”的发动者和参加者认定周围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都在向自己“刮妖风”、“放毒箭”时，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最大限度地使“大批判”中，“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喧嚣才那样惊天动地。更让人胆寒的，是无数血淋淋的诅咒：吴晗的屁股是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为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效劳。只要我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剥也的皮，看他的骨，……（32）……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33）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34）用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千钧锤，把中国的赫秃刘少奇，砸个粉身碎骨，血肉横飞。（35）可惜我们今天只能引用这孤零零的片言只句，然而在“文革”的实况中，它们却是与那铺天盖地的野蛮之海汇集在一起的，而这种凶残的诅咒与野蛮文化体系共同的泛滥，正是“大批判

”之“大”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上说，诅咒本来就是原始血亲复仇的重要方法之一〔36〕，所以凶残的诅咒在“大批判”中的泛滥，其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全民非理性犯法和复仇狂热的极度膨胀给予强有力的刺激（例如“文革”时的“全国内战”有“文斗”、“武斗”之分，其中“文斗”的主要内容就是复仇式的野蛮谩骂和相互诅咒），以及促使“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越趋强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中野蛮文化内核的膨胀同原始的诅咒巫术一样，必然造成受害者极大的心理恐惧，而这正是它们能够取得巨大的巫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原因之一。

关于诅咒巫术如何引起被诅咒者的心理恐惧、甚至使之迅速死亡，人类学家曾有过许多真切的记述，例如：坎农亲眼观察到一位澳大利亚土人得知自己被魔法所咒，遂即患病而死。魔法的效果和其它无数形式一样，主要是间接地影响对方的精神状态，被巫者对自身受咒杀的感知愈深，说明魔法的效果愈强，直至他精神的天平完全失去平衡，内心彻底绝望，加之不思饮食、水米不沾，最后无法抗拒意识带来的灭顶之灾而以死亡告终。〔37〕（在非洲多布岛上）有一种最为恐怖的称作“瓦达”的咒语。这种咒语是巫师亲自面对伤人念诵的。事前，巫师咀嚼大生姜，让身体发热以增加咒语的魔力，并且喝下大海水，使喉咙乾枯，目的是不会随唾液咽下自己恶毒的咒文。……近前后立即念诵咒文。受害人便会惊恐、痛苦地翻滚扭转，如失去理智的狂人一般，小便失禁，内脏受伤，精力耗尽，最后渐渐死去。现在看业，造成如此惨痛的恶果，与受害人坚信咒语的魔力有着重要的关系。〔38〕坎农除了记述□c多此类受诅咒而死的实例之外，还详细分析了迷信诅咒法力的人因受到诅咒后的恐惧心理而可能引发的各种致命的生理反应例如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的超负荷所导致的血压的急剧变化、脱水、休克、血浆从毛细血管中渗出等等，以此具体说明诅咒对被害者身心的巨大伤害。此外，他还指出：原始氏族中的成员“只有通过社区性活动，他们才能发展出强烈的集体精神来抗御各种能使他们的生活受到致命打击的神秘而邪恶的影响”，他一旦受到社会的诅咒，就由此“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部落社会的支持。在被孤立期间，他信仰的那些恶鬼就会包围着他，得以恶狠狠地、不可抗拒的折磨他，从而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邪恶力量。这个被吓坏了的悲惨无助的受害者心中尤其充满了对死亡这一直接威胁的恐惧，……他的气力像流水一样泄空耗尽；在一两天内他就死去。”〔39〕与上述且诅咒而使受害者绝望而死、孤立而死极为相似的施虐方式，正是“大批判”对无数受害者身心的摧残。例如“文革”最早的牺牲者之一、著名作家邓拓，就是因为无力抗拒“大批判”的残酷诬陷和诅咒、以及千夫所指的可怕境遇，遂自杀而死：……这些日子，邓拓一直在极度抑郁和沉默中度过。他几乎从早到晚都□c坐在书房里，忧思如焚。……在报纸上那些文章（王注：指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月10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次日全国报刊转载的文元《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等“大批判”文章）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都成了言外有意的“反革命黑话”。……5月17日一天直到深夜，邓拓一直在伏案疾书，向党组织作最后的倾诉：“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40〕受害者在自杀前的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申明自己确信所有这些诅咒（“黑话”等等）的天然合法性，这些残酷和无法逃避的强制性逻辑，显然只能发源于原始文化的“神明裁判”〔41〕。而更为残酷的，是“神明裁判”的强制性逻辑强迫受害者用自己对自己的诅咒和自己对自己的残害，投身于“大批判”这种全社会的诅咒狂潮之中。例如天津市的一位女医生在1966年8月28日与其父母一同自杀（方式是三人权衡许久，最后决定由

女儿先杀死父母，然后她再自杀）之前留下的全部遗言，即是将自己诅咒为充满毒质的“人民公敌”：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42）可见，诅咒已经被全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奉。

## 第二，诅咒之神圣功能的泛化，以及诅咒巫师的专职化。

因为咒语是最方便的巫术手段，它又能够随意模拟任何实际具体的巫术仪式，所以其应用日益广泛，甚至成为万能的工具。在西方的原始文化中，“没有东西能反抗咒诅的力量。……倚仗着手中的巫术曲调，就连月亮也可以从天上拽下来。”（43）我国晋代葛洪说：“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随后他举出咒语有驱鬼祛邪、禳灾除疫、远辟毒虫、刀枪不入、令水倒流，令敌人弩矢回射回自伤等等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奇效（44）。咒语之神力的这种极度的泛化，典型地反映宗教的非理性内核的自我膨胀逻辑。

诅咒原本只是一种具体的对敌手段，但是后来它却如费尔巴哈所说，进而升格为能够满足人们各种愿望的神明，这种原始宗教自我膨胀的逻辑及其导致的结果，在“文革”时同样可以看到。例如那时任何事情都要“大批判开路”，每遇天灾人祸、歉收减产等等各种事故，亦都要“大批促大干”。不仅每个成年人和青少年都要按照毛泽东规定的“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也被训练得把诅咒作为生存的本能。例如在著名的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幼儿园里，“天天给孩子们讲路线斗争的历史”；“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还不会说话，但只要大人一喊‘毛主席万岁’，他就笑举起小拳头，做出喊‘毛主席万岁’的样子；大人一说：‘恨恨刘少奇’，他马上就咬着牙，做出痛恨刘少奇的样子。”（45）“大批判”的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文革”时政治极度庸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与上述趋向相应的，是随着诅咒巫术运用的日益广泛而出现了许多专职的诅咒师。早在《周礼》中，就记有专司职的诅咒的巫官，汉代亦有“秘祝之官”，唐代仅太医署就有“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近除邪魅之为厉者。”（46）而民间的“咒师”当然更不在少数。较之古代的这种专职化为人们熟知的，则是在“文革”时，“大批判”不仅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从业者数量极为庞大：上至姚文元等，下至各级舆论传媒及一切或大或小的社会组织中都必须设立的“大批判组”、“理论队伍”等，皆以“随时批判资产阶级”为神圣职责。特别是现代“咒师”姚文元、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组）、洪广思（即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罗思鼎（即上海市委大批判组）等等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这种状况对于全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语言模式等等的巨大毒化（例如不论是“四人帮”还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中冒死反对“四人帮”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敌人诅咒为“妖魔”、“毒蛇”），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诅咒原本就是以语言中的巫力和毒性为存在基础的，所以它的极度泛滥，也就必然最直接地把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相互仇恨的情感方式灌输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 第三，“大批判”与诅咒在表述方式和语言习惯上的一致性。

“大批判”和诅咒既然都是要通过语言致害于敌人，那么这种语言在形式上亦必须具有能够致人死命的特点，上文介绍的“大批判”与诅咒语言的恶毒凶残，即是其典型表现。唐代韩愈曾记述当时驱鬼仪式上诅咒巫师的语言风格和文字风格：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谴虐鬼》）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恶毒凶残（“毒口牙”）是诅咒语言与生俱来的特质。

“文革”时凶残的诅咒语言我们已有举例，它们曾有过怎样惊人的泛滥也是举世皆知的，而现在更需要注意的是驱动这种毒质不断恶膨胀的巫术原理和巫术逻辑：几乎每一次“大批判”都必要加在敌手头上的罪名，必有“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等款，而所有这些罪名的深层，实际上都是对恶毒诅咒之效力的普遍信仰和极大恐惧，认为越是恶毒的语言，就越能够对被诅咒者（如“红太阳”、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等等）产生致命的伤害，于是就只能发明和普及更加恶毒的诅咒语言“以毒攻毒”（47）、实施反诅咒。“文革”时，有关“毒”的语汇铺天盖地既有用来诅咒敌人的，如“毒草”、“毒蛇”、“毒牙”、“毒素”、“毒根”、“放毒”、“毒箭”、“妖风毒雾”、“反革命毒汁”、“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也有用来形容自己的，例如“中了资产阶级的毒”等等，即是这种原始信仰通过“大批判”而极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而这种原始信仰的核心观念，乃在于巫术文化认为：异教神及其信奉者（异端、异教者）的灵魂、肉体、语言等等，无不具有剧烈而邪恶的毒性。例如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描写了女巫如何为麦克白炼制能够召唤鬼魂的可怕符咒。而炼制这些符咒所用的原料，除了有“豺狼牙”、“蟒蛇肉”、“蚯蚓刺”、“鸱枭翅”、“水蜥眼”、“鲨鱼胃”、“猩猩血”等各种骇人的毒物以外，同时还包括“犹太人的肝”！所以遵循这一古老的巫术原理，“文革”也就依旧认定牛鬼蛇神从头到脚都充满了邪恶毒性。因此，只有通过“大批判”而将更恶毒的语言倾写到他们头上，才能将这些毒质的具有者们致于死地。

与上述语言特点相辅相成的，是诅咒喧嚣的声音和不断重复咒语以加强其魔力。在巫术文化看来，凶恶的事物皆可以使鬼怪害怕、辟易，具体到诅咒，除了语汇的凶残外，声音气势的喧嚣亦是必需的手段。巫术文化还认为恶鬼惧怕巨大的声音，所以巫师驱鬼时往往要以鼓、爆竹等为神器。巫术文化的这些特征让我们马上想到“文革”的“大批判”时那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责骂声，万人齐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歌声……。 “大批判”的这种声威气势，不仅直接使被批判者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更主要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给宗教狂和近害狂的极度膨胀以强大的刺激。另外，对诅咒的不断重复，也是强化其魔力的方法，例如：（“文革”时西北核试验基地）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48）（某地在给“黑帮”戴高帽子游行时，逼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49）（三家村）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的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他，捣毁他！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材……（50）诸如此类对神圣判决的不断重复，当然都是为了把诅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而随着这类极端凶残而又声嘶力竭的诅咒之大普及，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彻底毒化和彻底单向化、以及“全民族的心理地狱”的降临也就是必然的。

诅咒与“大批判”在表述方式上又一重要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竭力追求强横谲诳、气势凌人的语言风格。因为诅咒发源于孱弱的原始先人抗御凶恶牛鬼蛇神的强烈幻想，他们物质手段和理性逻辑思维能力的极度低下都决定了诅咒的效力只能建立在非理性逻辑和对恶鬼极尽仇恨的心理之上。而这一文化特质在诅咒在语言风格上，当然也要有最直接的反映。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曾总结：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文心雕龙·祝盟》）

咒骂作为“横扫牛鬼蛇神”的基本方式，在历代都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比如东汉著名的文学家王延寿记自己梦中惊怒于“鬼物之变怪”，遂奋起而骂鬼、杀鬼。他的这篇文章用了许多生僻的字词形容各种各样牛鬼蛇神的凶恶丑怪，但好在全文大致的意思并不难懂：不外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用尽一切有关打击、杀戮的动词和描述鬼怪失败溃逃的形容词，以便为自己扬威壮胆（51）。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文章以这种煽情和咒骂为基本风格，这当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因为狂热的情绪是巫术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到驱鬼巫术亦完全如此，所以古人说：“以气凌人，则气盛而鬼不敢逼；稍有迁就，则气馁而苟乘之矣。”（52）毛泽东在通过编撰《不怕鬼的故事》而开始酝酿“文革”的“驱鬼战略”之过程中，亦反复强调“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53）又因为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原来用来驱鬼的诅咒亦被用作对其他政治敌人的声讨，故此上述文风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例如文学理论家刘勰曾概括古代军事檄文的风格为：竭力声称自己对敌人的讨伐代表了敌人的恶贯满盈，同时奋扬怒火，使文章充满了“横扫”敌害的气概（54）。中国古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残酷的政治厮杀，育成了许多这类奋其言辞、势吞仇敌的著名檄文，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专横的逻辑和语言而极尽对敌人的丑化和诅咒，并竭力声言敌人野兽一样的本性、他们为虐之烈，以及自己扫荡这些“丑类”时移山撼岳般的声威（55）。这类檄文不仅都直接袭用着巫术文化视敌人为“豺狼”、“妖孽”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模式，而且借助于政治和文学的广泛影响而使之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社会性潜意识。又由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对这一政治和文学传统的模拟，所以其风格在“文革”时的极度炽盛也就是必然的。其中取法乎上者，可以连篇累牍地写出气势如虹的“大批判”檄文；而才情贫弱者，也可以依靠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红宝书”中的檄文、以及“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等古来气吞万里如虎的名句喊得震天响而足具讨伐“牛鬼蛇神”的声威。甚至连当时数不胜数的“驱虎豹”、“风雷激”等等战斗队、造反团的名字，亦鲜明地带有上述语言传统的印迹。萧乾先生曾总结“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说理。文章的份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王注：显然，如果从文化根源上看，这两大特征即来自我们介绍过的原始文化以敌人为妖孽和诅咒时征引神圣的传统）随后，萧乾先生特别提出这样的问题：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一九）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56）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大批判”的这种语言风格及其文化内涵，的确都“早有其渊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批判”语言所造成的后果，还远远不仅是上述对煽情善骂文风的崇尚，较之这更为深刻得多的，是它以具有巨大“巫魅性”（马克斯·韦伯语）毒质的社会语言为工具而洗劫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并以“现代神话”虚幻的神圣性为范式而强制塑造了整个民族非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文革语言”的这种极为危害深重的文化功能，笔者将在叙述“文革”与法西斯主义文化环境的相似性时加以详细的论述。

注释：

（1）见《社会学研究》（北京），1993年第3期第69—78页。

（2）（英）弗雷泽著、李安宅译《交感巫术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1页。

（3）（6）（英）基思·托马斯著、芮传明译《巫术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404、354页。

〔4〕〔5〕（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0—01、82页。

〔7〕（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8〕〔30〕张紫晨著《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9、173页。

〔9〕见《诅楚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02页。

〔10〕〔43〕（德）恩斯特·卡西尔著、张国忠译《国家的神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6—317页。

〔11〕例如湖南侗族民众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鼓乐鞭炮声中，聚众用扫帚扫寨，并同时念诵“扫除一切是非口舌、乌烟瘴气、盗贼瘟疫”的祈语。又如贵州苗族民众每年要由巫师挨家挨户“扫寨”除魅，并同时念咒驱鬼，这种仪式成为当地的宗教节日。详见莫福山主编：《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又如在汉代宫廷驱鬼仪式（“大雩”）中，巫师就一定要手持扫帚，张衡《东京赋》记载：“尔乃卒岁大雩，殴除群厉。方相秉，巫觋操（《文选》卷三，63页，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影印本）；而列即是扫帚。

〔12〕〔50〕姚文元《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见《红旗》1966年第7期10、19页；第13页。

〔13〕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1966年第14期20页；古人认为魔鬼经常幻化为苍蝇，详见（清）袁枚：《子不语》卷四“鬼多变苍蝇”条（岳麓出版社，长沙，1985年版，80页），可见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后来的无数红卫兵将敌人指证为“苍蝇”，这原本出自一种很古老而又流行的诅咒巫术。

〔14〕《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内篇校释》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页。

〔1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斩（李）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虺氏。……（李）等伏诛，改姓虺氏。……（李慎）流于巴州，改姓虺氏”。（王毅注：“虺”即毒蛇。）

〔16〕J·施普林格、H·英斯季托里斯《巫女之锤》，转引自董进泉著《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7〕红尖兵《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1967年7月22日《解放军报》。

〔18〕以虫诸种扫荡害虫的民间风俗，详见莫福山主编《中国民间节日辞典》第293、50、304—305、294页。

〔19〕宋兆《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20〕《宋书》卷七《前废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页。

〔21〕《辽史》卷五十一《礼志三·军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5页。

〔22〕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不敢西射，畏轩辕这丘；”《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299页。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一《陆梦龙传》，第6263页。

〔24〕见《史记》卷三《殷本纪》、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版，第104、3234、1632页。

〔25〕宋光著《巫与巫术》227页、270页，与这类原始习俗一模一样，“文革”时亦往往是一并袭用以上诸种巫术方法。例如杨绛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部的“大批判”：“（1966年8月）有一晚上，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默存（王注：作者的丈夫、著名学者钱钟书字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将茶饮》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中国巫术信仰认为：唾沫可以禁鬼并使之失去幻化感人的魔力（详见〔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南阳宁定伯条”，199页，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以及今人陈来生著《无形的锁链神秘的中国禁忌文化》163—16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所以历代人们对于邪恶之物，往往向其吐唾沫以求去祟避邪，比如古代小学中的记述：“至今抗州人……若说道许敬宗，便人人厌秽，个个吐口涎沫。”（〔明〕周清原著：《西湖二集》第三十二《薰菰不同器》，61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1年版）“文革”中极为流行向“牛鬼蛇神”啐吐沫，则显然是这种驱邪巫术的延续。

〔26〕中国民间流行用狗血畜粪之类污物驱灭鬼魅、破除妖法，大量古代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中都有对此的记述。关于这种巫术方法的原理及其在“文革”中的广泛运用，笔者将另文详述。

〔27〕陆志天《邓拓，我们就是要斗倒你！》，1966年5月9日《解放军报》。

〔28〕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182页，1967年7月出版，书中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从本章已有的介绍中可以知道：“砸烂狗头”的口号，显然是以诅咒语言对自古以来砸烂鬼神和人物偶像以为厌胜等巫术方法的模拟。

〔29〕〔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第270页。

〔31〕见《续汉书·仪礼志中》，《反汉书》3128页。

〔32〕《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1966年第6期11页。

〔33〕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反工作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转引自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34〕湖北省红卫兵歌谣：《刘少奇算老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1968年版，第49页。

〔35〕佚名《献给工人同志的诗》（二首）之一《砸狗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63页。

〔36〕例如我国古代女真族“国欲：有被杀者，必使巫覡以诅祝杀之者，……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定一经诅祝，家道辄败。”（《金史》卷六十五《谢里忽传》，1540页，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版）又如族人在受阴谋伤害后，通常是以“反咒”加以报复。反咒仪式上，在“正面绑敌方主人夫妇草偶的（木板）下面，写上以牙还牙的咒语，大意是：你怎样咒死，也把你咒疯！”（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著：《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303页）

〔37〕〔美〕S·南达著、刘燕鸣、韩养民编译《文化人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7年版，第293页。

〔38〕王贵元著《女巫与巫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39〕沃尔特·B·坎农著《“巫蛊”死亡论》，见史宗主编、金泽等译：《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7页。

〔40〕顾行、成美《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之死》，见《作家文摘》第85期（1994年8月12日出版）。

〔41〕在亚、非、欧洲众多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流行有“神明裁判”，其方法是：遇双方发生争执时，即由巫师主持，在神的监临下架起油锅，把油烧沸，让双方



用赤手从锅中捞出某物，理直者因有神佑面必无恙，而伤手者必是因理屈触怒了神明。类似方法还有双方一起诅咒发誓，理屈者必被神明判处随诅咒语中规定的报应。对于这种裁判的方法和结果，无论是否反映事实，双方都必须绝对对服从，否则会遭到大众的强烈谴责和习惯法的严厉制裁。这种神判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极大的心理恐惧，甚至迫其自杀。（详见夏之乾著：《神判》1—32页）

〔42〕〔48〕冯骥才著《100个人的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6页。

〔44〕见《抱朴子·至理》，《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03—104页。

〔45〕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46〕《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第1876页。

〔47〕“以毒攻毒”是一种很古老的原始文化观念，古史中就有帝“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等恶鬼必须用最凶恶狠毒的手段才能对付。

〔49〕甘铁生“虔诚的日子”，见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31页。

〔51〕原文为：“吾含天地之纯和，何妖孽之敢臻！尔乃挥手振拳，雷发电舒，昔斤游光（王注：“游光”以下至“赤舌”皆为诸种鬼魑，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频，扑茗尧，魑，搏，蹴睢盱，剖列蹶，掣羯孽，劓尖鼻，踏赤舌，……于是群邪众魅，骇扰遑遽，涣衍叛散，……鬼惊魅怖：或盘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宛转，或捧痛而号呼，……嗟妖邪之怪物，敢于人之正度！”（《艺文类聚》卷七十九，1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2〕（清）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4页。

〔53〕详见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69—70页。

〔54〕《文心雕龙·檄移》：“天子亲戎，则称恭行无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征诛。……使生如冲风所击，气似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文心雕龙注》378页）这里所说的“枪”即是慧星，民间称为扫帚星，可见自古以来这类声讨文章就要具有一种“横扫”的气势。

〔55〕例如孟子对异端思想家的声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本2714页）再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掎其后；若举炎火以飞蓬，覆沧海以沃炭，有何不来者哉！“（《文选》卷四下四，618页）又如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武则天）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残害忠良。……爱举义旗，以清妖孽。……班声动，北风起，剑气冲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九，2009—2010页，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影印本）

〔56〕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2期

~~~~~

【不堪回首】

文革：蹂躏下偷生  
• 巫宁坤 •

【编者注：作者一九五一年自美回国到燕京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后历任南开大

学等校教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一九六〇年奉准“保外求医”，与家人团聚。】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份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我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往我家，把我从床上揪下来，连拖带拉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场。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象”，株连全家大小。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个孩子经常听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八岁的女儿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照著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八月中，“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回校后推广“革命造反经验”，甚么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抄家，连我家的自行车都被不由分说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九月，又勒令我久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岁的寡母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安大，回原籍扬州。我提著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著老人家白发苍苍，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夫妇、各党政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教授，下至临时工和掏粪工人，彷彿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我这个小小临时工竟然也算一条大鱼，和校、系领导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时，我成为众矢之的，有时也曾怀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真可说“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所有脏活、累活都成了我们的专业，因为革命师生和工人都忙于“干革命”。劳改时间长达每天十小时。我有过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炼，在一群文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重劳动力。合肥的盛夏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不但无雨，而且无风。从早到晚，或是拉著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

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著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著“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甚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暑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沈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予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沈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著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沈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著拐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从马鞍山钢铁厂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工人师傅们也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每天口完晚饭就驾临“牛棚”，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专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发。刁师傅每晚来逼他承认是蓄意反对毛主席，得不到满意的答覆，就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师傅酒性发作，挥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队运动”开始“落实政策”，大多数“牛鬼”都陆续“解放”，下放农村。我妻子儿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荣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又折腾了一年，才“落实政策”；停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总算出了“牛棚”，当上“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广阔天地的无业游民。直到文革快结束时，再一次“落实政策”，有了碗饭吃，苟全性命于乱世。七九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但时至今日，竟然连生存权也被某些狠人剥夺了，难道历史非得走回头路不可吗？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都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 摘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

原载《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

## 【文献资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  
1967. 01. 13,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